



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张文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袁泉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宜春市人民政府、宜春市文化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丰城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文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文物报、文物月刊、国家博物馆馆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等数十家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均有代表与会。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代表考察了洪州窑曲江寺前山窑址,观摩了历年洪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精品文物标本,并以主题发言和自由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对洪州窑的历史地位、窑业面貌、产品和工艺传播、兴衰原因以及遗址的保护与规划利用等问题展开探讨,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取得预期的成果。现综述如下:

1. 洪州窑的发现与研究。洪州窑自1977年发现以来,经过数次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重大成果。1979年江西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1992~1995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丰城市博物馆联合,先后开展过三次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洪州窑遗址的分布范围;2004年又发掘了丰城陈家山洪州窑遗址,进一步明晰了洪州窑早期遗址瓷业的面貌。目前确定的洪州窑遗址分布面积达50余平方公里,现已发现窑址30多处,主要分布于赣江和与赣江相通的药湖、清

丰山溪一带。学者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洪州窑考古调查、发掘情况及研究历史做了简要回顾,同时对今后的关注视点和研究方向各抒己见,提出展望。

唐昌朴和余家栋先后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洪州窑遗址的勘查、发现与考古发掘情况,再现了历史源流考证与考古资料推断相结合确定洪州窑所在地的艰辛历程与工作进展;简介了目前确定的洪州窑遗址分布范围和产品面貌。

张文江系统梳理了洪州窑的研究现状,较为全面地列布了代表性的工作成就和著述成果,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为文献著录及文献考据阶段,时间从唐代至20世纪60年代。第二为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阶段,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第三为全面调查、重点发掘和系统深入研究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同时,对当前的基础工作和学术研究现状做出了思考,提出有计划地扩展丰城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文物调查;在全面充分保护现有瓷窑遗址的基础上有目的地重点选择一些地方重点发掘以及更新、完善、充实瓷窑遗址的保护理论和技术手段方法的可行建议和工作展望。

张浦生提出要推促洪州窑全面研究的展开,应放宽视野,重视产品消费享受地区出土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将传统考古和科技相结合,建立系统的科技数据库,文理兼及,打破传统人文科学的局限性。

李德金对洪州窑研究课题的走向提出了两点展望:其一是窑炉发展体系变迁的系统研究,其二为洪州窑产品内销与外销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海外发现地的确认。

秦大树提出在洪州窑销售路线的探讨上,应关注产品传输与当时交通路线的密切关系,如闽北地区洪州窑瓷器的大量发现,即为隋唐时期入闽通路

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依证;同时,发现于东南亚的洪州窑瓷器,很可能是产品自江西、经闽北、入福州,在沿海口岸装船出港。

欧阳世彬认为当前洪州窑生产流程面貌的揭示与复原尚待深入,全流程的制瓷技术研究应为今后的工作重点。

2. 洪州窑历史地位的界定。洪州窑是我国东汉晚期至五代时期重要的青瓷窑址,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瓷器产区之一,生产期长达八百多年。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肯定了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分布范围广,烧造历史悠久,延续时间长,位列唐代六大青瓷名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权奎山首先对陆羽《茶经》的洪州窑在六大青瓷名窑中的排名做出了新的审视,认为其局限于当时的审美意识,且评价标准是青瓷釉色是否与茶色相配,并非是对当时六大青瓷名窑综合客观的评价。实际上,无论是从烧造历史、产销水平还是工艺技术,洪州窑在六朝至隋唐的制瓷手工业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首先,就烧造时间和规模而言,洪州窑烧造时间长,规模大,卓立于同时期的南北瓷窑。其次,产品质量和销售区域上,洪州窑产品不仅发现于江西地区,还广见于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湖北、河南、陕西等省的东晋至唐代中期的墓葬中,销售区域之广,在当时的名窑中是比较少的。再次,从工艺技术来看,洪州窑最早出现了匣钵装烧工艺、试火具和阶级状(一级)龙窑,在当时的制瓷手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综上,权奎山认为,洪州窑自成体系,既具有时代的共同特征,更具有鲜明的特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张浦生将洪州窑纳入整个江西陶瓷发展史考察,认为江西地区的陶瓷生产先后出现过三个里程碑。其一是东汉至隋唐时期的洪州窑,其二是五代至宋元时期的吉州窑,其三是五代至今的景德镇窑。而丰城地区的洪州窑生产在江西、乃至全国陶瓷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秦大树从成熟青瓷中心范围的扩展角度,对洪州窑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思。他认为洪州、越州、岳州等地的瓷业生产前后相继,各有起伏,其生产高峰的此起彼落反映出六朝隋唐之际青瓷产业中心的转移。如越窑的自东汉晚期至西晋进入其生产高峰;东晋至隋代,洪州窑则一跃居前,进入其生产的蓬勃发

展和成熟期,取代越窑处于全国瓷业领先地位,逮至晚唐五代,越窑再度兴起,中国成熟青瓷的生产中心就这样在不同区域间转移并渐次扩展。

3. 洪州窑生产技术的传播及其与其他窑业传统的互动。

周世荣将越窑和岳州、洪州窑分别划归青瓷生产的两大系统,并从胎釉装饰上归纳出二者各自的特点。其中越窑胎质较细,以刻划花为主,洪州窑和岳州窑胎质略粗,以印花为主。

权奎山则进一步明确了洪州窑和岳州窑瓷器的区分方法。他认为岳州窑胎色灰白,较浅淡,胎质较细致,釉色泛青,釉层薄,玻璃态明显。纹饰内容流行叶片纹、小团花纹和方框式条纹。而洪州窑胎色分深浅两种,分别为浅灰泛黄和深灰色,产品施化妆土,剥釉明显,釉色青中泛黄,开片处釉色深。纹饰内容更为丰富,自成体系。这些均为辨识岳州和洪州窑产品面貌的重要标志。

余家栋在比较洪州窑、岳州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及江西瓷业面貌的多元性。他认为鄱阳湖周围的瓷业面貌接近越窑,而采用釉下彩装饰的产品则与湖南长沙窑更为接近。

黄晓枫通过洪州窑、青羊宫窑、邛窑部分器物比较,探讨了两汉至隋唐时期中国青瓷生产中心的技术交流与互动。东汉后期成熟的青瓷产生以后,瓷器生产逐渐扩展到长江中游的赣江流域和湘江流域,形成了几个生产中心,两晋、南朝时期青瓷生产区域扩展到沿海的闽广地区和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从南朝开始,以青羊宫窑、邛窑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制瓷业逐步进入了生产的成熟的时期,其后的4个多世纪里,同四川地区的许多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成都平原的制瓷业从长江水道和蜀道两个方向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瓷器的烧制工艺,青羊宫窑、邛窑与洪州窑在生产形态和产品面貌上表现出的相似性,表明了赣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制瓷业上的交流。

任志录在概述广东发现青瓷面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与洪州窑同期产品的比较。广东地区自南朝起开始出现釉层玻璃态明显且易剥落的青瓷产品,其器形、釉色与装饰与洪州窑类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晚唐时期,相关瓷器在广东各地的墓葬、窖藏与其他生活遗迹中均有大量出土。

4. 洪州窑兴起与衰落的背景考察与动因探究。

(下转第107页)

⑤① 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

⑤② 夏鼐:《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考古》1982年第5期。

⑤③ 这是笔者的感觉。如李济,除了为《中国考古小史》作序外,在生平300余万字的著述中再也没提过卫聚贤。夏鼐也是如此,仅有的提及卫聚贤的《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一文中,对卫聚贤也暗含讽刺。此外,石璋如在长达30多万字的口述史《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中,提及了很多同时代许多学人,但一次也没提及卫聚贤。阎文儒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写过山西汾阴后土祠和荆村的发掘,但是只提董光忠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卫聚贤。

⑤④ 卫聚贤和孔祥熙是山西同乡。据傅振伦介绍,卫聚贤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任职期间,得到兼任

行政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的信任与倚重。此外,孔祥熙还在卫聚贤主办的《说文月刊》发表过文章(孔祥熙:《西北文化》,《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

⑤⑤ 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⑤⑥ 散木:《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文史月刊》2004年第2期。

⑤⑦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收入李济著:《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⑤⑧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155页)

洪州窑始烧自东汉晚期,历六朝隋唐,至晚唐五代渐至衰落,凡八百余年。对洪州窑兴起的历史背景、生产传统以及其走向衰颓的内外动因,广大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关注。

余家栋通过对2002年赣江北岸东汉龙窑以及与青瓷产品发掘情况的介绍,揭示了洪州窑早期的瓷业生产面貌,初步澄清了南方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与成熟青釉瓷器间的关系。认为洪州窑成熟青瓷是楚越文化交融的产物,其在南方制瓷传统上博采众长,延烧创新,自成体系,提出江西地区是中国青瓷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王光尧通过系统梳理从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洪州窑兴起的历史机遇与传承体系,认为江西地区青瓷的兴起与原始青瓷体系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是汉代以降楚越文化结合的产物。

针对晚唐五代洪州窑生产渐至衰颓的原因,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探寻答案。秦大树认为晚唐五

代时期洪州窑生产成本的逐渐提高,从而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欧阳世彬则认为晚唐已降,洪州窑的窑具渐趋粗化,直接导致其装烧工艺停滞不前;同时当地的地势局限陶土原料无法完成精细的淘洗,这种原料上的局限使洪州窑产品失去了进一步精化和上升的空间,渐渐滞后于时代主流,最终为历史所淘汰。

5. 洪州窑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与会学者就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洪州窑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怎样合理利用文化遗产、促进地方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徐怡涛作为洪州窑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的主要策划人,就遗址保护、管理、展示和利用现状、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做了客观评估,同时按照不同级别,阐述了相应的划分原则和保护措施,分两个阶段预置了今后的考古规划以及相应的居民动迁、企业整治等社会调控方面的规划部署。

(责任编辑:刘慧中)